**讽刺的艺术**

写于1938 年的《华威先生》是张天翼的代表作，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。它与《速写三篇》(1943 年出版)中的另外两篇《谭九先生的工作》、《新生》，在当时的左翼文坛上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。而其中的《华威先生》是里面最为有名的一篇。作品篇幅不长，也没有什么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，也缺乏扣人心弦、跌宕起伏的艺术构造。作者采用了漫画式的手法，通过寥寥无几的勾勒，生动的刻画了人物的灵魂，突出体现了作者犀利的笔锋和尽情揶揄的讽刺力量。其作品讽刺艺术主要表现在对比描写上的讽刺性，语言风格上的讽刺性，情节设置上的的讽刺性。

**一、通过鲜明的对比, 达到绝妙的讽刺效果**

这种鲜明的对比体现在多个方面。首先，优雅的风度与发火失态的对比。华威先生是个十足的“绅士”。你看他“立刻戴上帽子”，“永远夹着他的公文皮包”，“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”，同时“左手无名指上还带着结婚戒指”，“抽雪茄烟”，“翘兰花指”，十分注重仪表和形象；对他的夫人，他张口“我太太”，闭口“ 密斯黄”，又是多么的文明和现代；开会时，他总是“拍几下手板”， 显得很有领导的风度，优雅高贵。然而，当他没能参加战时保婴会时，他则一反优雅的姿态，“打听、调查”，开始逼问、威胁、恐吓，直至成为战时保婴会的委员；当他没能参加日本问题座谈会时，他“发脾气”、“吼着”、“猛地跳起来了”、“瞪着眼”、“咬着牙，嘴唇在颤抖着”、“没命地喝许多酒”，最后，撕下文明的面纱，出口谩骂“混蛋”“妈的”。原来他优雅的外表和风度只是故作姿态，装出来吓唬人的，一旦有一点点威胁到他所谓的领导地位的风吹草动，就会令他丑态毕露、歇斯底里，毫无风度可言，甚至丧失了最起码的仪态和尊严。

其次是日常“工作”中忙与闲的极端对比。作者为了达到讽刺效果, 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手法，专让华威先生在一个“忙”字上下功夫。他的一切动作、言语（包括潜台词）都突出了一个“忙”字，就连走路都显得很“忙”。他坐的包车“‘叮当，叮当，叮当——’一下子就抢到了前面”，“黄包车立刻往左边躲开”，“小推车马上打斜”，“担子很快让到路边”，“行人赶紧避到两旁的店铺里去”，“来不及看清楚就跑得老远老远”，“像闪电一样快”，“速度全城第一”，极其夸张的写法，耳边却依旧回响那马达的声音。华威先生每会必到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普天之下，仿佛就他华威先生忙得不可开交。他经常“掏出表来看一看”，“把表放在面前”，“一脸丰满的肌肉立刻紧张起来、眉毛皱着、嘴唇使劲撮着”，“立刻就走”，表面上，为了抗日工作, 华威先生真可谓是“惜时如金”。可在忙的背后，他的“闲”就慢慢浮出水面。“他每天都这么忙着”，除了不停地参加会议，在会上发表他的不着边际、空洞无物的两点意见, 到处干扰别人的正常工作，耽误别人的宝贵时间之外，就是在会场上与小胡子之类的人物议论他的喝酒经历。这就是他忙的内容——每天不是别人请他吃饭，就是他请别人吃饭。所谓的“忙”不过是一个幌子，他其实是虚张声势，欺民扰民，忙于泡会、应酬、宴请，虚伪无聊而又毫无时间观念的党棍。

另外, 不同场合媚上与欺下的对比。华威先生不断地奔波、忙碌，地点的瞬间转换，近似的语言，类似的行为，却夹杂着细腻的差别。“难民救济会”，华威先生在进入会场时表现得很庄严。他“点点头”，“眼睛并不对着谁，只看着天花板”，旁若无人，态度傲慢；“拿着雪茄烟打手势”，限定“主席能够在两分钟之内报告完”，他“猛地站了起来”，“摆摆手”打断主席报告，然后抢先发言，发言后“挺着肚子走了出去”，又“把当主席的同志拽开”，“伸出个食指顶着主席的胸脯”，居高临下，颐指气使。而到了“文化界抗敌总会”， 除了迟到、早退、发表意见之外, 他立刻换了另一种态度, 另一副嘴脸。脸上堆满了笑容，对每个人点头，甚至于“伸了伸舌头，好像闯了祸怕挨骂似的”，一再表示“对不住得很”；他不再刮洋火吸烟，“拿出一张纸条，写几个字递给了主席”，征得主席的同意后，才“点点头站起来”，并且分别向主席和各位参会人员“腰板微微地一弯”，这种表现与前场会议大相径庭，一反前面的盛气凌人，而显得卑躬屈膝，判若两人。这恰恰从另一方面反证了他自负之下的自卑,主性之下的奴性。不同的态度，不同的嘴脸，不禁让人联想起契科夫笔下的“变色龙”。不同场合中人物的不同态度、不同表现的鲜明对比, 在看似漫不经心的描写中，勾画出华威先生骄妄、虚伪、庸俗的国民党忠实走狗的奴才嘴脸，达到讽刺与揭露的效果。

看似简单的情节，但却处处暗藏玄机。作者有意通过人物言行的巨大反差, 来揭示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与内心世界。不同场合，不同的面孔，言行相悖，表里不一，鲜明的对比，入木三分的刻画，对人物不加一点评议, 用逼真的细节进行对照,一下子就可以触到人物灵魂的深处。同时把强烈的情绪、鲜明的讽刺蕴含在文字深处, 从而达到“不着一字, 尽得风流”的淋漓境界。

**二、个性化的语言包含讽刺性**

在一部国外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专著中这样写道:“在表现不同阶层人物的语言的准确性和广泛性这方面,没有一个作家能超越张天翼”[ 1 ]，说明张天翼小说的语言是不容忽视的。张天翼小说语言明快洗炼、泼辣风趣、诙谐幽默，运用纯熟通俗的语言，特别是借小说中他人之口，采用反复的、矛盾的语言艺术，与整个塑造形象的色调完全一致，从而表现了主人公假抗日、真独裁，犹如“披着羊皮的狼”的可憎面目。读他的小说，时而让人捧腹大笑，时而让人掩嘴抿笑。无论是愤激的冷笑、鄙视的嗤笑、还是轻松的嘻笑、含泪的苦笑，笑声中总让人领悟到作家所特有的不露声色的讽刺才能，以及小说所具有的幽默、尖峭的语言美感。

（1）运用反复的段落和语言加深讽刺效果。相同的行为举止在不同段落反复出现，多次铺陈渲染。而最精彩的的是，无论这会那会, 万变不离其宗，华威先生每会必讲，反复强调的就是两点: 要大家特别是青年人必须认定一个“领导中心”“加紧工作”。这两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见，更是三次以类似的句式和段落出现。对象不同、场合不同，会议内容不同，但华威先生认定一个“领导中心”的滥调却始终如一。真可谓是任凭风浪起，稳坐钓鱼台，以不变应万变。这些语言和段落的运用，一方面就像诗歌的反复咏叹，加深了读者对作品主人公的印象；另一方面，让读者透过这种机械呆板的形象和语言，觉得主人公就像《装在套子里的人》的别里科夫一样可悲可笑。

（2）运用虚假和矛盾的语言加深讽刺效果。“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。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。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。”而事实上，我们的主人公到底做些什么呢？到处赶场子开会，扯一些闲话，发表一些无关紧要的意见；每天喝酒，喝醉后“一回家就睡倒了”；到处抢战领导岗位，甚至不惜一切代价，打听、调查、训人，遭到顶撞又徒唤奈何、拼命喝酒、大骂青年，显得色厉内荏。“今天刘主任起草了一个县长公余工作方案，硬叫我参加意见，叫我替他修改。三点钟又还有一个集会。”“王委员又打了三个电报来”等等，故意提升浮夸，好像自己真的有多么了不起的责任和能力一样。这些到底能算什么工作呢？主人公的灵魂和可笑的形象暴露无遗。

**三、在情节设置上强化讽刺性**

没有情节的连贯性，没有故事的老套路，也没有关于华威先生的完整的故事,甚至连他的年龄、籍贯、生平、学历等都没有交代，似乎额外的话都是废话。只是简单的描写了5个小小的人生片断,就像画家东涂一笔,西抹一下,一个官僚型的文化人形象就仿佛在读者面前转了一圈，奇迹般地构成了。然而他的生成似乎又不是偶然，归功于巧妙的情节安排，强化了小说的讽刺效果。

（1）详略安排体现了讽刺效果的最优方案。三个会议，作者首先详细地写了第一个会议，从会前赶路，到进入会场、其他参会人的反应、推选主席、要求发言，再到发言后离开会场、又返回安排了解问题等，通过大量的细节描写，写出了一位抗战中“政界要人”的“光辉”形象。第二个会议写得极为简略，仅用了三个自然段约二百字。同时详细地写了主人公参加的第三个会议，从进入会场、坐定闲话，到要求发言等都写得极为详尽，特别是对会前、会中的谦恭态度刻画得淋漓尽致，活画出一个可悲可笑的跳梁小丑。作者这样安排，恰恰突出了主人公参加各类会议的两个极端，从鲜明的对比中尽显讽刺效果，把华威先生这位“政界要人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。

（2）以“蒙太奇”的手法展现戏剧式的场景。作者采用电影“蒙太奇”的手法，直接剪辑了最能体现主人公性格特点和讽刺效果的几个片断，构成小说的主要章节，情节展现宛如一部短篇戏剧，分别展现了华威先生在路上、会场上、家中三个场景的艺术形象。我们如果从戏剧的角度去改编这部作品，可以说根本不用费多大力气，因为这篇小说本身就是一部戏剧，无论是舞台效果、人物形象、对白台词等都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，并且十分符合戏剧“三一律”等的原则要求。这样，就像让主人公直接到台前表演，更增强了讽刺的真实性和可信度。

 （3）以“我”作为外视点贯穿小说的全篇。这种写法类似于常见的一些散文的表现手法，让整篇小说形散神聚，中心突出。在小说中，“我”只是主人公一个转弯抹角的亲戚，既不是其上司，也不是其下属，更不是其如“密司黄”般的亲属，因而比较容易站在一种客观的、非功利的角度，去审视主人公的一言一行，具有十分独到的眼光。华威先生不是下属眼中的高高在上，不是领导眼中的奴颜卑膝，也不是亲属眼中的多苦多累，而是令人信服的这种极具讽刺意义的典型形象。我们可以从贯穿作品的“我”中，看到作者本人的形象，他正是在一般作者忙于表现抗战的光明中，看到了抗日运动中的阴暗面，冷然揭出了华威先生这种抗日破坏分子的形象。

短短五千余字，一个人物，几个速写镜头，几乎连矛盾冲突都没有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情节，却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。“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，华威先生之多，犹如恒河沙数，而在日常生活之中，我们更不断地接触得到…华威先生的时代还没有死去。”[2]这就是作家独特的讽刺魅力。张天翼先生是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。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，“有很多作家刻意学鲁迅，或被人称为鲁迅风的作家。但是称得上是鲁迅传人的只有张天翼，无论在文字的简练上，笔法的冷隽上，刻骨的讽刺上，张天翼都较任何向慕鲁迅风的作家更近似鲁迅”。〔3〕他用那支锐利的泼辣辣的讽刺笔刀，毫不留情地挑开旧制度下一个个丑陋、颤栗的灵魂，将“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别人看”[4] ，以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和轻快、谐谑的讽刺笔调，去揭示华美外衣下的愚妄和可笑，用笑声来戳破社会的虚伪和丑恶，正如赫尔岑说:“笑是最有力的破坏工具之一”[5]，在笑声中对丑恶人物，丑恶道德予以彻底的否定，在笑声中让人警醒，显现出冷峻峭利的幽默特色。这种峭利劲捷、明快尖刻、愤激夸张的讽刺艺术的运用，风格犀利明快，谑而不虐，有铺陈渲染，汪洋恣肆之美。不仅加大了张天翼小说的讽刺力度，而且还增强了张天翼小说的时代气息，丰富和提高了美学价值，在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艺术中，独树一帜，彪炳史册。

**【参考文献】**

[1]夏志清. 中国现代小说史[M] . 美国:耶鲁大学1961

[2] 蒋星煜《论华威先生》

[3]司马长风《中国新文学史》中卷第二十章P81

[4]张天翼. 谈人物描写.

[5]瓦·斯卡尔仁斯卡娅. 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[M] .